

老北京

的传说

「招牌·招幌·市井」

品味北京丛书

张其成

刘秋霖
刘健
关琪
张春元
邢仙
编著



刘霖

刘健

关琪

张春元

邢仙

编著



老北京的传说

「招牌·招幌·市井」

品味北京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 1 序
- 1 老字号
 - 3 东安市场
 - 6 玻璃厂文化街
 - 7 荣宝斋
 - 13 一得阁
 - 15 来薰阁书店
 - 17 清秘阁
 - 19 萃文阁
 - 21 戴月轩
 - 23 文盛斋
 - 24 庆云堂
 - 25 同乐苑
 - 27 萃珍斋
 - 28 汲古阁
 - 29 墨缘阁
 - 30 松筠阁
 - 31 宝古斋
 - 32 张一元文记茶庄
 - 34 吴裕泰茶庄
 - 36 福德厚

老字号

全聚德、同仁堂、稻香村、一得阁、王麻子、瑞蚨祥……这些耳熟能详、散发着浓郁特色的名字，有着一个共同的称呼——老字号！老字号是一段岁月封尘的记忆，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珍贵照片。它们代表了历史年轮中最精彩的印记。每一块老牌匾上都写满了人间的沧桑与悲凉。这些老牌匾和它们的店主人一样，背后记载着一段段故事，一个个传奇。

“头戴马聚源，脚踏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这民谣道出了老字号曾经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过去的老字号大多是前店后坊，生产经营的商品重质量、讲信誉，“童叟无欺”、“言不二价”。老字号在其发展过程中，创出独特的经营之道，成为一种知名品牌。这种老字号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是其他东西不可替代的。然而，随着时光飞逝，有许多老字号由于无法适应时代的变革已经离我们远去，渐渐变成我们身边的一段历史。当人们意识到它的价值时，只有到文献里去寻觅。这个遗憾，我们希望引起关心和支持国产品牌的人们的重视。记述老字号的历史，讲述它们今昔的变迁，相信不但会给今天的人们留下许多耐人回味的东西，也会为将来收藏起一份珍贵的历史。

东安市场

外地游客逛北京，一定要逛王府井，而逛王府井则一定要逛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可算是老北京城最早的一座“现代商场”，它从创建至今，足有百多年的历史。

关于它的来历，据说在清光绪末年，东安门外大街两侧有许多小商贩摆摊做生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提出疏导东安门外大街交通，将大青条石道路改修马路的计划。因此，将这些小商贩都迁至一个废弃已久的清八旗练兵场内，这个练兵场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金鱼胡同西口南侧，占地约有三十亩，周围有土墙，铁大门。

开始时，这些小贩不愿意往这里迁。因为东安门外大街过往行人多，买卖好做；而这个“练兵场”里空旷没有人，本来就是小本生意的买卖实在难以维持。但是，清政府下令，不得不迁。迁来的小贩大多推小车，也有担担子的。商贩们随便占地，将小车、担子摆在什么地方都行，没人管。这些小贩有的是卖豆汁儿、扒糕、烧饼等小食品的，有的是卖铁锅铁勺、笼屉等日用杂货的，有的卖棉布、针头线脑等生活用品的，还有的卖木枪、京剧花脸面具、空竹、风筝等儿童玩具……

这个练兵场改成小贩摆摊的市场后，刚开始确实生意惨淡。不仅顾客少，连闲逛的人都少。干了些天，有的小贩因为天天赔本就不再来了。但是，也有陆续新来此摆摊的，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小商贩们来来往往不断。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宫内有一个姓王的大太监看中了这块地方，他拿钱在这个市场的东北角盖起一个简陋的茶园，让别人替他经营，为了吉利就将这个茶园命名为“吉祥茶园”。

吉祥茶园里经常请来一些京剧、曲艺、戏法等演员来此献艺。茶客只付茶费，看演出不必另花钱，因此，招来很多人到吉祥茶园喝茶看戏。当年北京人，许多喜欢京剧、京韵大鼓、单弦等演出形式。但是从清帝进关，在北京城坐稳了皇位后，就



明令内城不准建戏园,所以内城人要看戏必须出前门去看。吉祥茶园开业后,极大地方便了家住内城的人,并且花壶茶钱就可以过戏瘾,因此,吉祥茶园天天高朋满座。连带的这个市场的人也就多了,买卖也日渐兴隆起来。内城巡警就派人进行管理,整顿摊位,让摊贩登记,慢慢地市场规模已经形成。

市场有了,叫个什么场名呢?因这里离东安门很近,又因为开始时是东安门外大街的摊贩最先开辟的这个市场,所以名为“东安市场”。也有一说,因地属东城,又求平安,就这么被叫出来个“东安市场”。



随着东安市场的形成,摊贩们越来越多,顾客也就越来越多,渐渐进入良性循环,不到十年便形成南北一条正街,东西四条胡同为骨架,以畅观楼、丹桂茶园、东安楼、南花园、杂耍场等商家为重点,有三百多个行业,六百多家商场和货摊的大商场。如宣统元年(1909年)刊印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上写到“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在这里如要购物,布匹服装、日用百货、玉器古玩、珠宝钻翠,应有尽有;想打个茶歇儿,听戏,有吉祥、丹桂两家茶园,东西分立。老北京人泡上一壶茉莉香片,眼睛微闭,细品台上名角们的西皮二黄。丹桂的头牌是梨园名宿谭鑫培,吉祥的挑班是艺坛新秀梅兰芳。梅兰芳头一次排时装戏《孽海波澜》,在这里一炮打响,天天客满。

另外,老北京的普通人最早品尝西餐,多半也是在东安市场。那里最早开了两家西餐厅,一家叫“其士林”,名气很大。还有一家叫“国强”。这里虽是西餐馆,却有点洋为中用的劲头,卖的饭菜虽是西餐,可陈设布置保持中国茶楼原状。八仙桌,硬木椅,服务员穿白长衫,绝对的民族风格。既然在这里完全体会不到西餐馆、咖

啡厅的风格情调,为什么其生意还挺红火呢?这可能跟中国人重视食品滋味多于餐饮环境有关。六十年前在这里掌灶的有位师傅,做德国菜非常拿手,据说北洋政府时的黎元洪总统,曾专门骑马到这里来吃他的“铁排鸡”、“铁排杂拌”,饭后还加上一杯浓咖啡。

转眼间,东安市场开业已满百年。无论从外部建筑造型,还是内部经营品类,随时代改变,改建后已很难想象它当年的面貌。但人们会记住这里是北京人走向新潮生活的第一站。

琉璃厂文化街

有“九市精华萃一衢”之称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和平门外南新华街。东西走向，在南新华街两侧，分为东、西琉璃厂，长约一公里。沿街古旧图书、金石陶瓷、碑帖字画、文房四宝等店铺，鳞次栉比荟萃于此地。

琉璃厂唐代名“海王邨”。辽金时尚为城郊一偏僻小村。因元代兴建大都，在此烧造营建都城之琉璃砖瓦而得名。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大兴土木，建造皇宫、坛庙、王公府邸等所用之琉璃砖瓦多赖此地之琉璃窑烧制，当时皇家曾派太监监督窑厂。直至清末，窑厂始迁往京西。

琉璃厂成为书肆荟萃之地始自明季。初时每逢科考，文人雅士聚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修纂《四库全书》，促进了琉璃厂的繁荣，“凡古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此，几无他物焉。”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凡鉴赏、收藏古董字画，或研究古籍，引证经典的文人学士，莫不以琉璃厂为必到之处。鲁迅先生居京期间即为琉璃厂的常客。琉璃厂的文苑气息，历二百余年而不衰，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古文化街。

1980年，国家对琉璃厂进行了彻底改建。街道改为方形水泥砖墁地，厅堂多改为二层小楼，瓦顶和砖雕形式多样，多宝窗、月洞门、朝天栏杆等式样也被广泛应用，处处彩画贴金，成为一条富丽堂皇的街道。

荣宝斋



公元1894年，刚刚结束的甲午海战似乎并没影响到大清子民的生活，京城里依旧一派安静祥和。就在这一年，琉璃厂一家店铺悄然挂匾开业，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荣宝斋。如此低调的开始自然包含了主人的一番心思，这还要从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说起。

松竹斋的主人原是居于北京椿树胡同的张家，浙江绍兴人氏。祖上在明朝为官，清军入关后弃官从商。松竹斋开业是康熙年间（1672年）的事，主要经营试子、文人所用的书画用纸。道光年间，松竹斋的生意传到张仰山手上。张仰山的书法篆刻堪称一家，但个人兴致却不在店铺生意上。所以，此时的松竹斋生意日渐萧条。清代，各地举人齐聚京城会试，考试用的纸张就是由松竹斋承办的。刊印试卷既能扬名，又带动宣纸、笔墨的销售，可谓一举多得。然而到了仰山这一代，试卷用纸却被懿文斋买通官家抢走了。不久，忧愤交加的张仰山便撒手人寰，紧接着独生儿子也不幸英年早逝，家族的重担落在了他儿媳张李氏的肩上。此时的松竹斋已是债务缠身，这份百年家业似乎已走到油枯灯尽的地步。

可就是这张李氏，一位弱女子使松竹斋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在荣宝斋珍藏的从1894年至1949年的经营账目《万金老账》上，我们得以窥见松竹斋重生的秘密。一向以家族方式经营的松竹斋开始外聘经营者，第一任经理庄虎臣和东家签的合约上打破了当时分成（分红利）东家占大多数的惯例，提出和东家平均分享经营所得，并规定“东家无故不准干预铺事”。

庄虎臣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商人。他不仅具备了丰富的商业冒险经历，并和当权者有着密切联系。在他看来，松竹斋要想起死回生必须另辟蹊径。经东家同意，他放出口风说松竹斋已面临破产。同时暗地里购下琉璃厂86号的一处铺面，暗中

将松竹斋的货底如古玩、字画等秘密送到这家铺面。松竹斋只剩一座空壳，随时都可以宣告破产。庄虎臣还和东家商量好，委托一个亲戚做荣宝斋的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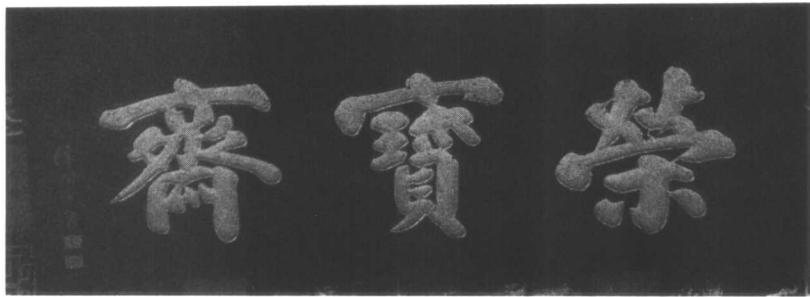
1894年，荣宝斋开业了。名字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虽然没有大肆声张，但债主还是出现了。债主是华俄道盛银行，松竹斋的债务正是来自于这家银行。虽然华俄银行对荣宝斋的开业多方干涉，但因没有抓到证据，加之庄虎臣竟能请到帝师翁同龢题匾（亦有说“荣宝斋”匾额由同治年间的状元陆润庠题写），可见在朝廷能量之大，这件事最终竟不了了之。荣宝斋这幅金字招牌，从此，堂堂正正地挂在琉璃厂，开始它的风雨传奇。

开始的荣宝斋，很会做朝臣的生意，专门腾出一间屋子给下朝来此的大臣们换朝服。但此时的庄虎臣明白，荣宝斋要想在琉璃厂立足，仅凭简单的扩大经营范围是绝对不行的，需要一项核心业务来支撑。

1900年，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到北京城。庚子之变使贪婪的列强找到借口，蜂拥而入的强盗大规模劫掠全城。事态平息后，这场浩劫带给荣宝斋的却是新的商机。据民俗学者陈重远介绍，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琉璃厂为德国兵占领。许多店铺把门一关人就跑了，德国兵肆无忌惮就在那儿抢东西。庄虎臣没有跑，而是站出来和其他几位商人一起维持治安。所以德国人在荣宝斋虽然拿了一些东西，但不像在别处那样纵火，店铺损失较小。逃亡返京的光绪得知庄虎臣维持治安有功，就赏了他一个七品官（该是慈禧太后赏的，以皇帝的名义罢了）。

庄虎臣看重的是这个七品顶戴带来的商业利益。当时做官的都希望搞到京城官员名录。官员们升迁罢免每年每季都有，而在京城做官必须了解哪些人最有权势，哪些人失势……这里无疑蕴藏着巨大商机。所以，每当上朝，庄虎臣便会穿起朝服走进宫城禁地，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去抄录乾清宫前最新的官员任免名单。由于资料来源极其可靠及时，加上制作讲究，荣宝斋印制的缙绅录很快成为朝中大小官员的抢手货。

伴随着暮鼓晨钟，荣宝斋走进了20世纪。此时，它已成为琉璃厂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店之一。掌柜庄虎臣也慢慢走到其人生尽头。东家为表彰庄虎臣的功绩，决定在他去世后的十年内照发工资和他在职时拿的三个人力股的一半；荣宝斋的殿堂里还挂着庄虎臣的遗像，并由东家撰写赞辞。



王仁山,字寿贤,学徒出身。他靠自己出色的管理才能,伴着荣宝斋从上世纪20年代初,走过了以后风云突变的许多年。王仁山其貌不扬,沉默寡言。东家对他的评语是“老成持重、万金可靠”。然而这个老成的王仁山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个出乎大家预料的决定:东家和其亲戚朋友以及王仁山家人和其亲戚朋友,一律不许到荣宝斋来做事。他说摆脱这个裙带关系,才能方便经营。

琉璃厂除古旧书画以外,近现代书画家的作品也大多在此销售。当时最普遍的售卖方式是将书画明码实价地悬挂在店里,俗称挂笔单。王仁山执掌店面时期,荣宝斋逐渐成为书画家挂笔单的首选之地。民国年间,书画界最为走俏的是“北溥南张”。北溥指以溥心为代表的皇室宗亲;“南张”则指远在四川的张大千。“北溥”身在北平,挂上他的笔单不难,但如何能挂上“南张”的笔单,王仁山十足下了一番功夫。把美食看得和作画同等重要的张大千,每到北平必会被王仁山请到萃华楼欢宴一番。年深日久,王仁山和张大千成了至交。

每年春节,琉璃厂举办的厂甸庙会可以说是一年中最大的活动。每到这时,各家店铺都会把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书画展示出来。一方面可以售卖,同时通过比较也可以确立自己在琉璃厂的位置。荣宝斋当时有十六个窗口,这十六张画作以前都是一人一张。在北京是很难拿到张大千的作品的,而张大千竟给荣宝斋画了十六张!

不久,五十四岁的齐白石也只身来到北京。由于齐白石的画比较冷逸,当时北京人不大喜欢这种风格,加之他为木匠出身,受到一些画家的歧视。所以尽管他的画出价很低,但仍是买家不多,处境相当艰难。经人介绍,齐白石把画拿到了荣宝斋。王仁山慧眼识珠,大胆地把他的作品挂在荣宝斋最显著的位置,并大力向客人



推荐。由此，齐白石在书画界的名声日渐提高，他也和荣宝斋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居住着不少皇亲贵族，也集中了大批政府官员以及文化界、知识界等各界名人。荣宝斋的发达，无疑得益于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但在1927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南京、上海成为各种新贵商贾名流云集的中心。其中不少人愿意一掷千金，为自己的厅堂置办几件体面的名家字画。王仁山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变化，在他的奔走下，荣宝斋先后在南京和上海开设分店。一度分店营业额竟数倍于北京总店。

正当王仁山为荣宝斋规划着美好前景的时候，国内形势却急转直下。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同年11月上海失守。此时的荣宝斋只剩下南京分店一家还未陷于敌手，而南京分店正是荣宝斋货底最为集中的地方。12月的一个清晨，北平荣宝斋的店员们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敲门的正是从南京逃回来的本店店员。一向和颜悦色的王仁山勃然大怒，大声斥问为什么没有留守在南京的店铺。几日后，余怒未消的王仁山就听到了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消息。这一次劫掠彻底伤了荣宝斋的元气。虽然此后王仁山苦心经营，情况稍有好转，怎奈时局多变。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内战争又烽火重燃，本已元气大伤的荣宝斋再难有回天之力，到新中国建国初期，荣宝斋已是债台高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50年，荣宝斋公私合营。但在新环境下该如何经营，谁的心中都没有底。特别是对于二十七岁的公方经理侯恺来说更是如此。侯恺首先要做的，是让自己尽快完成由军人到商人的转变。他回忆说，当时苦恼得很，自己什么也不懂，看着墙上挂的字画，觉得乱七八糟，毫无意义。于是换成前苏联画报、人民画报、小人书还有年画，这些搞起来倒也挺新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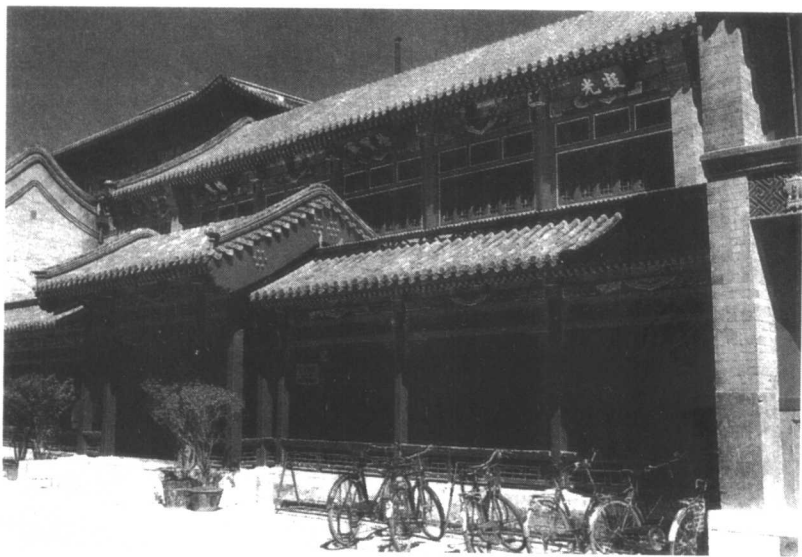
以这些商品的微薄收入，就连荣宝斋的日常开销都无法满足。没过多久，荣宝斋重新陷入困境。有人说，这种山沟里爬出来的土豹子，屁也不懂。侯恺听到气愤不已。他一方面作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同时也四处求贤问友。每到夕阳西下，他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天坛的石甬道上，往来踱步。此后知道这一典故的老友都称此处为“侯恺发愁处”。

这以后，荣宝斋一天天步入正轨，而侯恺却并不满足。在他的意识里，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应该更上一层楼，再次迎来它的辉煌。此时，他想到荣宝斋同其他老

字号相比,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大的优势,就是一批老师傅掌握着一套其他老字号没法比的木版水印技艺。这一点,王仁山(时任副总经理)也曾经很诚恳地提出过自己的设想。他说:“徐悲鸿的奔马,齐白石的花鸟草虫备受人们喜欢,如果能请二位大师为荣宝斋画些这类作品,再由我们精心搞成木版水印,或许可以一举两得,既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又充分利用了荣宝斋木版水印的优势,经济上也会有较好的收入。”

王仁山的建议很快付诸实施。1950年5月,遵照当时出版总署的决定,木印科(大众美术社)同荣宝斋合并。木印科的同志再加上荣宝斋原来搞木版水印的同志,创立了木版水印车间。并由荣宝斋的老师傅王宗光任车间主任。自此,荣宝斋成功印制了徐悲鸿的“奔马”以及齐白石的“墨虾”、“花鸟小品”,并大受群众欢迎。以后,又印制了敦煌壁画,接着又选印出版了新罗山人大幅花鸟……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现已闻名海内外。其制作工场的师傅们均为艺林翘楚,这是当今任何印刷方法都无可与之相比的。

木版水印技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唐代咸通九年(868年),有一名叫王阶的人使用此技术刻《金刚经》扉页插图,现尚流传于世。唐以来书籍多附插图,16世纪始有彩色套印。近数十年来,荣宝斋在这一传统技艺基础上不断加以



改进创新,获得新的发展。不仅可以印制诗笺小品,而且能印制工艺复杂的绢本绘画和巨幅长卷,几可乱真。荣宝斋用木板水印法制作过的《七十二候诗笺》、《二十四节令封套》等,鲁迅、郑振铎先生见后曾称它为琉璃厂诸笺肆中之“白眉”(杰出)。

目前,荣宝斋汇集了大量古今书画家的真迹或木版水印书画,这些精美的作品,深受欢迎。除了作为国礼赠送国际友人外,还广为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学术团体收藏。另外,荣宝斋还供应文房四宝,提供装裱、加工修复等服务,为书画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便利,为繁荣书画艺术市场、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每天光顾者络绎不绝,其中有各界名流,直至国家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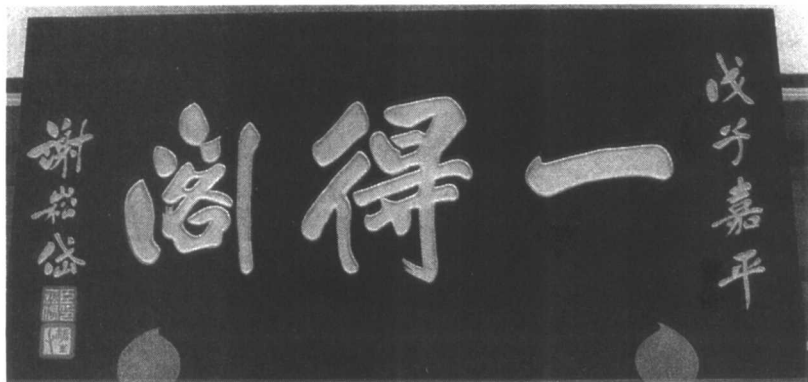
侯恺从1950年出任荣宝斋经理,直至1985年离休。他是第三代“掌门人”,并亲历了荣宝斋这几十年的兴衰变化。今日荣宝斋,已成为人才济济、声名卓著的国有涉外文化企业,被公认为展现我国传统艺术之窗和对外文化交流之桥。国际友人说:“不到琉璃厂,等于没到中国;没进荣宝斋,等于没到琉璃厂。”

一得阁

“一得阁”于清代同治年间(1865年)由谢崧岱创建。和原来的松烟墨不同,一得阁生产的是墨汁,为当时人们书写绘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是中国墨汁制造的第一家,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年历史。

谢崧岱是南方进京赶考的书生,不幸落第,生活无着,便在城南开设了一间制造墨汁的作坊(即现在东琉璃厂67号处),自产自销,开始时生意就很兴隆。他亲自书写对联,上联为“一艺足供天下用”,下联为“得法多自古人书”。而“一得阁”这个店名就是以两联首字取之。谢崧岱亲自书写的匾额“一得阁”至今保存完好,现仍挂在东琉璃厂门市部。

有人说,谢崧岱在选店址时找到了风水宝地。原来的老店址,东边靠东北园胡同,西边靠双鱼胡同。好似两根轿杆抬起一得阁。制作墨汁离不开水,因此,双鱼是“水里求财”。这些说法当然没有什么根据,但也证明当初一得阁的买卖兴旺。后来,一得阁传至徐洁滨。他是河北深县人氏,谢崧岱的弟子。此人头脑灵活,经营有



方。过了些年，一得阁为扩大生产开设了墨汁制造厂。他们沿用人工古法制作，先后在文人荟萃的天津市和郑州市开设了分店，又在上海市和西安市联合办专营代销店。

生产的墨汁有两大类。油烟类的品种有：云头艳墨汁、兰烟墨汁、亮光墨汁、桐油墨汁、大单童和双童墨汁、油烟墨汁等。松烟类的品种有：阿胶松烟、五老松烟、小松烟等。油烟墨汁是书画家们用的佳品，松烟墨汁是书写小楷字和工笔绘画的佳品。它的配方比例按照季节气候进行调整，以适合四季的气候变化。

此外，一得阁还生产八宝印泥，也是传统的独家配方产品。印泥需要百年的蓖麻油进行调制，经过太阳晒和寒天冻，使之一年四季适用。他们生产的印泥颜色纯正、印鉴清晰，不怕日晒、不怕火烤、不怕水浸，久存不干、气味清香。

启功先生曾题诗曰：砚池旋转万千磨，终朝腕力费几多。墨汁制从一得阁，书林谁不颂先河。著名书法家陈叔亮老先生试墨时赞曰：一得阁墨汁色泽纯美、胶度适中、挥洒流畅，墨中之宝也。